

再看《山海情》：它以影像方式参与到乡土文学的思考中，其成功启示我们——

“山海相合”的新时代创业史如何写就？

杨宸

在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再一次观看电视剧《山海情》，更感受到了其中所包含的波澜壮阔与荡气回肠。该剧在结束了首轮播出之后热度不减，二轮亮相央视八套黄金时间，至今豆瓣评分仍维持在9.4的高位，参与评分的人数则增加到了近29万。

在此之前，没人能想到一部讲述东西部协作扶贫的电视剧竟然成了2021年的头号爆款。

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在年轻人中并不少见的《山海情》接受方式：把它看作一篇种田文。种田文，来源于模拟经营类游戏，在网文中发展壮大，顾名思义，就是指主人公白手起家，克服万难，开发建设一片区域。《山海情》讲西海固的吊庄扶贫，把干沙滩变金沙滩，把荒漠戈壁变绿水青山，确有一番经营种田的意味。

这可能是年轻一代理解一部扶贫剧的方式，也可以部分解释《山海情》的吸引力。但是，这种对应在简化问题的同时，也会遮蔽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更关键的或许是，《山海情》以充满时代气息的扶贫题材、经营种田的叙述节奏以及与文学截然不同的艺术样式所复现出的那个传统：对农村变革的史诗性呈现。可以追问的便是，这种复现的成功之处何在？在曾经“移山造海”的豪情之后，一部“山海相合”的新时代创业史应该如何写就？

村里回来了马得福：

一个具有真实感召力的基层干部形象的回归

“创业难……”

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柳青、赵树理等一批作家将笔触对准了“移山造海”般“创业”的农村巨大变革。在他们笔下，出现了许多令人钦佩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然而这样一种文学传统之后一度断流，不仅扎根农村的基层干部在文艺作品中缺席，对农村变革的呈现也转化为了城乡二元对立中农村的固守或迷失：要么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要么是乡土生活的破碎。1990年代中期，有一些作家曾试图以“现实主义冲击波”恢复对农村变革的直接表现，但囿于改革当时所经历的阵痛，其笔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虽然多了些真实的人情私欲，却在令人手忙脚乱的琐碎现实中被“淹没”，难以形成有效的感召。

究竟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书写农村变革，“复活”一个具有真实感召力的基层干部形象？

在此意义上，《山海情》中基层

干部马得福的“回村”可能恰逢其时。

老实讲，马得福并没有那么高大完美，但却更加真实可感。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媒介特质不同带来的创作思路转变：文学作品中心理呈现较为容易，而电视剧里更能凸显人物的则是戏剧冲突。因此，不像之前一些小说里的角色，马得福对扶贫政策的领悟就是在经营种田式克服困难的冲突中完成的。最初时，马得福也只是单纯听信领导“画大饼”，说国家政策就国家政策，说塞上江南就塞上江南，但在体认和解决通电、引水、种菇等吊庄户实际困难的过程中，马得福也逐步理解了“政策是人定的”、塞上江南也得“一步一步发展”的道理。正如马得福在和张主任交心时所言：“没有一天的工作是轻松的，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但恰恰是在接踵而来的困难、事情和冲突里，在一点一点取得成果的过程中，观众才能和马得福一道在种田经营式的节奏中体认到了扶贫工作的不易与意义。

而在这些困难中，最为瞩目的便是贫困。不同于一些劣质电视剧让贫困只存在于台词和概念里，《山海情》用情节和视觉让西海固地区人民曾经面临的贫困真实可感。触目惊心的干旱贫瘠与钢铁较硬的讨食生活，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情体验。

正是这些体认与共情，成为了观众理解马得福行为逻辑的基础。这样，



《山海情》讲西海固的吊庄扶贫，把干沙滩变金沙滩，把荒漠戈壁变绿水青山
配图均为《山海情》剧照

马得福带领村民上访，甚至不惜冒着牺牲前途的风险也要向领导汇报村民种菇现状等行为，也就有了有效的叙事与情感支撑。

显然，马得福是由拥有新的叙事条件和节奏的现实主义“复刻”出来的农村基层干部。他褪去了些许既往人物的理想光环，也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很多冲突的解决中，得福的努力都不能决定事件的结局），但他却能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贴近大地”、深入人心。

群像塑造与时空意识：

通过“根”的转换，新的历史经由扶贫变革正在展开

以往对农村变革的书写有着明确的史诗意识，就是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变革。这就要求创作者

塑造出各个阶层中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群像。这一点在柳青、路遥等创作的反映农村变革的作品中都有体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不仅有当时的贫苦大众，还有富裕农民、技术人员、各级党政干部等人物形象。正是一些丰富的典型，充实起了一部“史诗”。

这种史诗意识在《山海情》中也得到了继承。

率先“吃螃蟹”的农民、外出务工的女性、奉献一生的乡村教师、为扶贫出谋划策的本地和外来干部……《山海情》刻画了一大批生动的人物群像，其中尤以“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小农代表李大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代表麻副县长、西海固贫苦妇女代表李水花为典型。而且这些形象不仅只是具有代表和典型化的功能性作用，还拥有鲜活且不可缩减的生活与情感内容。

以李水花为例。她虽然表征了贫困地区妇女的命运，但一方面，她和马得福的感情线在第一集就结束，不至于使其沦为如其它电视剧一般撒狗血灌水的工具，另一方面，演员热烈

的精彩表演充分展现了水花面对不幸命运的悔恨、面对贫困生活的坚韧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丰富的情感加成使其非但不是为贫困地区妇女的悲惨命运辩护，反而激起了观众“不让李水花悲剧再出现”的情感波澜。在网站哔哩哔哩上，关于李水花情感命运的剪辑播放量高达四百多万，不少人因此“入坑”，可为这种典型性与鲜活性的证明。

另外，《山海情》的史诗意识还表现在它阔大的时空意识。

空间意识首先在剧名上体现出来。宁夏福建，山海相逢，这是以往农村变革书写中没有的新内容，它为扶贫史诗提供了一个东西国土的宏大空间背景。不过，该剧更突出的还在于对时间意识的呈现。这种呈现不仅是指电视剧中情节展开的时间跨度数十年，更在于它对西海固历史的一种勾连、融汇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它将西海固的这些历史转换为了一种关于“根”的表述——

在电视剧临近尾声的时候（对应种

田中主人公面临的最后一难），马得福为动员整村搬迁，追溯了马李两家的历史，并且认为迁村不是“断根”（断绝历史）而是“移根”（接受历史并使之延伸），“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哪儿了，哪儿就能再扎根”。通过“根”的转换，西海固的现实主义得以历史化，既往的历史被融汇接纳，而新的历史经由扶贫变革也正在展开。《山海情》由此获得了充分的历史意识。

由此可见，《山海情》不仅是以经营种田的节奏对扶贫题材进行的叙事调整，更是以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具有典型特征与阔大时空意识的史诗谱写方式对农村变革书写传统的一次真诚复现。换言之，就是它以影像方式参与到乡土文学的思考中，其成功证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仍然拥有无限的可能。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第三只眼”看文学



《洛城花落》
周大新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大新自2008年以《湖光山色》荣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依然笔耕不辍，平均每三年左右就会推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而且这些新作的题材还在不断拓展，更加聚焦当下社会民生热点。比如《曲终人在》关注的是“反腐”，《天黑得很慢》则聚焦于中国已经到来且日渐突出的老龄化社会建设；在告别不凡的庚子而迈入充满希望的辛丑之际，周大新又推出了探讨男女爱情婚姻问题的新作《洛城花落》。

在《洛城花落》这部被称为“中国人的情感教育小说”中，周大新先是以一个“月老”的口吻，叙述了一段姻缘的从何而来，继而用“拟纪实”的手法，通过法庭对这段婚姻濒临解体四次开庭的庭审记录，如实呈现出控辩双方对此的不同认识及看法。说实话，这段姻缘的起承转合并不奇葩，相信大家日常生活中听到的或看到的

远比这要更加富于戏剧性；大新在编织这个故事时也偶有欠周密之处，庭审过程中双方辩护人的陈述更时有冗赘之嫌。因此，就故事本身而言，《洛城花落》说不上有多么出彩，但作品提出的问题及留下的思考却无疑是十分重要和耐人寻味的。

《洛城花落》的叙述者“我”是这桩婚姻的“月老”，作为双方各自父亲曾经的战友，彼此间私交又甚笃。因此，这桩婚姻有了“我”这个了解双方家境与人品、“月老”从中牵线，在彼此开始交往之时就多了一重知情，少了一些盲目，理论上也可算是婚姻中保险系数最高的一种；男主角公雄王慎来自河南，女主角曲岚则出生山东，双方家境虽说不上富足，但也衣食无虞，彼此水准都差不多，可算得上是另一种“门当户对”；俩孩子均毕业于名声显赫的985高校，毕业后都顺利留在了帝都，各有一份虽说不上富足但也还算体面的工作。在“我”的撮合下，俩人在北京从相识、相知、相爱到最终牵手结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还称得上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自由恋爱、两情相悦的小家庭还没到人们常说的婚姻“七年之痒”时居然

就要面临解体的危机，而且还直接一纸诉讼闹上了法庭。

这是为什么？《洛城花落》虽完整地呈现出这段姻缘始末，但重点却是落在探究导致他们婚姻危机的缘由到底是什么？作品的思辨性远大于其故事性。在我看来，这也恰是周大新这部长篇新作的价值之所在。

在当下社会各种婚姻危机中，工作压力、买房压力、孩子成长、老人赡养、移情别恋等常常成为导致婚姻最终解体的一些重要诱因。这些几乎是多数新婚家庭都需要直面的问题在周大新笔下都没有被回避、被美化：王慎和曲岚这两个外乡人所组成的新“北京人”之家所要面对的“妻子、孩子、票子、房子和车子”这现代“五子”问题一个也不少，孩子已经五岁，一家三口却还要挤在与人合租的那两室一厅的小房子里，从老家过来帮他们看孩子的岳母只好将床安放在共用的客厅中，在床周围拉上布帘子勉强栖身。所幸的是，即便面对这样的生活窘状，小俩口日子依然过得还算有滋有味，妻不物质不庸俗不嫌夫穷；丈夫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还干着一份兼职，剩下的时间就是一门心思勤奋写作多挣稿费。遗憾的是，没有

夫妇最终依然深陷互相怀疑猜忌的泥潭而难以自拔。尤其是曲岚面对丈夫突如其来冷淡，更是由猜疑直至转化成“原告”，一步步走进了离婚的法庭……

由此可见，在《洛城花落》中，周大新更关注的显然是人在感情这个难以言说领域中的微妙变化。作品中呈现出的这场婚姻危机清晰地显示：生活的艰难远不如信任缺失更有杀伤力，王慎和曲岚的经历便是如此。

在《洛城花落》后半部分，即王慎和曲岚离婚案四次庭审，尤其是前三次的庭审实录中，读者能够很清晰地看到法庭上那种刀光剑影、女强男弱的基本格局：作为原告的曲岚伶牙俐齿、刀刀见血，一副欲将婚姻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男方的阵势；而被告王慎则完全处于消极防守的被动状态，不是小心翼翼地解释就是态度虔诚地认错，力欲挽回这段姻缘是他的全部表情。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表面上的水火不相容，相信读者还是能够捋出一条双方从怀疑到猜忌到决裂之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路线图。

如前所述：王慎和曲岚的这段姻缘说起来也算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自由恋爱、两情相悦，但细读文本又不难发现在这二人组合中，双方在心灵上那种平等的

匹配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有所缺失。王慎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或许是因为自己皮肤黑，或许是因为自己不能给妻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或许是格外珍惜自以为来之不易的这段婚姻，因而在与曲岚的相处中总是显得小心翼翼格外谨慎，自己有事特别是负面的事更是不敢对妻子坦率直陈；而曲岚的心思又显然不若王慎那么缜密，性格上总体更要阳光率真一些，平日虽大大咧咧，未必在乎细节，但女性天然的对细腻与敏感又使得她对丈夫的任何变化都不会浑然不觉。这样一种极其细微的“不平等”之根自然来源于王慎骨子里深处的那种自卑或不自信，再加上曲岚总体上的粗线条，因此一旦彼此间有了缝隙，男性不敢言，女性更不容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王慎第一时间将自己不幸意外染上艾滋病的遭遇对曲岚和盘托出，既不是悄悄地去找自己的女性同乡大夫医治，也不是刻意回避妻女以防传染给她们，曲岚会因此而断然提出离婚吗？遗憾的是，现实从来就无法假设，当一切真相大白于天下时，裂口已然形成。此情此景，伤口虽可缝合，但疤痕却已是去之不掉。

尽管《洛城花落》以曲岚发出“天哪！庭长，快派人去救他呀……”这般撕心裂

肺的呼号而戛然而止，但我们继续不妨大胆想象下去：即便王慎被救了回来，即便曲岚撤回了诉讼，这两口子日子还过得下去吗？即便日子还在继续，那法庭上的相互攻讦字字句句句句心，不能在双方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可见，当婚姻走到了这一步，无论结局如何，且不说是否死亡，质量必然大打折扣毋庸置疑，尽管现代法律为保护婚姻还设置了“离婚冷静期”这样的缓冲区，但能被“缓冲”的恐怕还只能是婚姻之形式却未必能抵达双方之心。

上述这样一番论证其实正是周大新《洛城花落》这部新作的社会价值之所在。据国家民政部披露：2018年我国一方面有1010多万对新人结婚，另一方面又有380多万对夫妻离婚，离婚与结婚之比为38%。面对如此不低的离婚率，《洛城花落》其实传递出一个十分朴实的道理：爱情需浪漫，婚姻更需学习与经营，其内容不外乎平等、坦诚、理解与包容。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许多有关婚姻的“秘诀”往往要到离婚的法庭上才令人幡然醒悟，从这个意义上看，《洛城花落》何尝又不是一部小说版的“婚商学”呢？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